



日本为什么成功





2 020 7876 8

日本为什么“成功”

—— 西方的技术和日本的民族精神

〔日〕森岛通夫 著
胡国成 译

四川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六年·成都



责任编辑：杨忠学

封面图：广 军

插图：王贻华

装帧：盛寄萍



走向未来丛书

日本为什么“成功”

胡 国 成 译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自贡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960mm 1/32 印张9.375插页5 字数140千

1986年4月第一版

1986年4月第一次印刷

书号：17118·164 印数：1—50,000.

定价：1.35元

Why has Japan 'succeeded' ?
western technology and the Japanese etho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

日本为什么“成功”
西方的技术和日本的民族精神
〔日〕森岛通夫著
胡国成译

1981/6

编者献辞

《走向未来》丛书和读者见面了。

她凝聚着我们的心血和期望。

我们期待她能够：展现当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日新月异的面貌；反映人类认识和追求真理的曲折道路；记录这一代人对祖国命运和人类未来的思考。

我们的时代是不寻常的。二十世纪科学技术革命正在迅速而又深刻地改变着人类的社会生活和生存方式。人们迫切地感到，必须严肃认真地对待一个富有挑战性的、千变万化的未来。正是在这种历史关头，中华民族开始了自己悠久历史中又一次真正的复兴。

在艰苦而又富有生命力的改革道路上，我们坚定了马克思主义的信仰，理解了科学的价值，并逐

步深化了对我们时代和民族的认识。今天，我们听从祖国的召唤，热情地投身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潮流。

马克思有一句名言：“思想的闪电一旦真正射入这块没有触动过的人民园地，德国人就会解放成为人。”*今天，照亮我们民族的思想闪电，就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精神和我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以及由此开始的创新！

《走向未来》丛书力图从世界观高度把握当代科学的最新成就和特点，通过精选、咀嚼、消化了的各门学科的知识，使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能从整个人类文明曲折的发展和更迭中，理解中华民族的伟大贡献和历史地位，科学地认识世界发展的趋势，激发对祖国、对民族的热爱和责任感。

她特别注重于科学的思想方法和新兴的边缘学科的介绍和应用；把当前我国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以及文学艺术方面创造性的成果，严肃地介绍给社会，推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结合。

《丛书》是个新的园地，她将自始至终贯彻严肃认真的学风和生动活泼的文风。

*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卷，第16页。

《走向未来》丛书，从她一开始就受到老一辈共产党人关怀，受到学术界前辈的热情支持。

约四百年前，弗兰西斯·培根在《伟大的复兴》一书序言中，曾经这样谈到书中描述的对象，他“希望人们不要把它看作一种意见，而要看作是一项事业，并相信我们在这里所做的不是为某一宗派或理论奠定基础，而是为人类的福祉和尊严……。”我们怀着真挚的感情，把这段话献给《丛书》的读者，希望广大读者关心她、批评她、帮助她。

让她成为我们共同的事业。

《走向未来》丛书编委会

一九八三年六月于北京

《走向未来》丛书顾问

(按姓氏笔划为序)

包遵信 严济慈 杜润生 张黎群 陈一咨
陈翰伯 钟沛璋 侯外庐 钱三强

《走向未来》丛书编辑委员会

主 编：金观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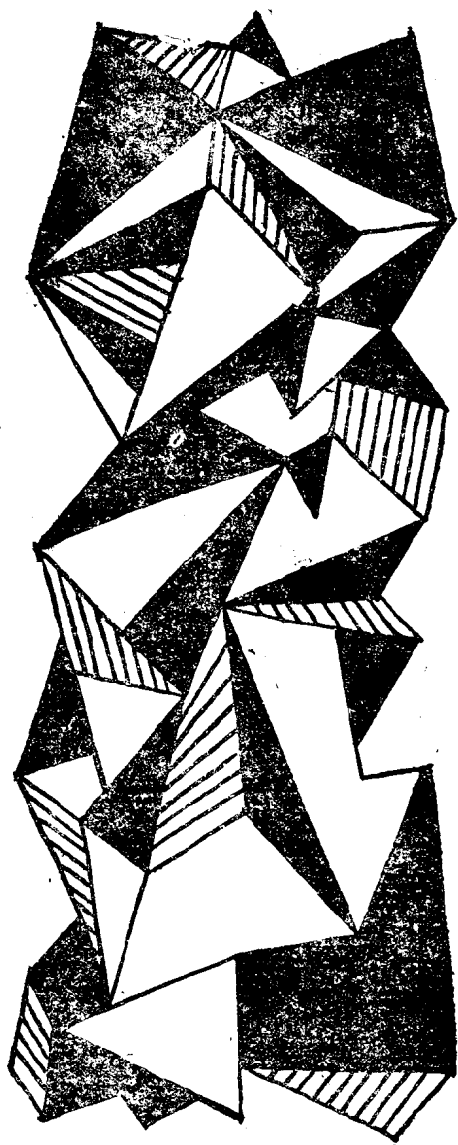
副主编：陈越光 唐若昕

编 委：(按姓氏笔划为序)

丁学良	王小强	王岐山	王军衡
王晓鲁	王 焱	尹蓝天	乐秀成
朱嘉明	朱熹豪	刘 东	刘青峰
严家其	何维凌	张 钢	阮芳赋
陈子伶	陈越光	易小冶	金观涛
秦晓鹰	贾新民	翁永曦	唐若昕
陶德荣	黄江南	董秀玉	樊洪业
戴士和			

目 录

导言	(2)
第一章 大化革新及其后	(30)
第二章 明治维新	(78)
第三章 日本帝国(之一)	(132)
第四章 日本帝国(之二)	(182)
第五章 旧金山政体	(230)
结论	(280)



导 言

1

卡尔·马克思认为，意识形态和伦理道德不过是作为基础的物质条件（特别是经济条件）的反映；而马克斯·韦伯在他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则证明了与此相反的关系的存在，他认为，一个社会的伦理道德是既定的；任何一种类型的经济，如果它要求人们具有一种与这个伦理道德相违背的民族精神，那么这种经济将不会发展；反之，如果一种经济与这种伦理道德相一致，那么它必然兴盛起来。韦伯正是运用这种观点考察了世界的主要宗教。

韦伯所得出的关于儒教的结论可以归纳如下：儒教，正像清教一样，是出于理性的；不过，二者之间存在一个基本差别：清教的理性主义寻求运用理性去控制世界；儒教的理性主义则试图在一种理

性的方式中使自身去适应世界。韦伯进一步得出结论说，儒教信奉者的这种思想方式，正是阻碍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兴起的一个主要因素。

尽管结论是这样，韦伯仍然承认：“中国人很可能有很强的能力（这种能力如果不比日本人更强，也会和日本人相当）吸收在近代文化领域中技术和经济非常发达的资本主义。”但是，必须指出，日本的意识形态，或者至少是日本意识形态中最重要的部分，也是儒教。由于韦伯很少明确地谈到日本，这一点就不是很清楚（至少从他的《儒教和道教》中来看），他是否认为日本是一个信奉儒教的国家。此外，韦伯是否认为日本已经达到的“资本主义”是与遵奉新教伦理道德的“现代资本主义”属于同一类型，这一点也很不清楚，韦伯对此并未做出明确的论断。不过，尽管有这些缺欠，上述韦伯的这些论述本身却提出了新的研究方向。

在下面的研究中，我希望阐明这个事实：在某些重要的方面，日本的儒教是非常不同于中国的儒教的。此外，与儒教同时传入日本的道教，经历了相当大的改造，发展变化为日本的神道教。在欧洲，由于对相同的《圣经》作出不同的解释，其结果是

耶稣教与天主教决裂；然后耶稣教建立了一种全新的行为伦理道德，即韦伯所谓的“现代资本主义的精神”。与此情形完全相同，日本的儒教开始时与中国的儒教信奉同样的准则，但是由于对这些准则所作的不同研究和解释，其结果是在日本产生了一种完全不同于风行于中国的民族精神。在欧洲，由于各国之间领土相连（与日本和中国大陆以及朝鲜半岛之间的距离相比较，即使是英国这样的岛国，与欧洲大陆也不过是被英吉利海峡所隔，实际上和与邻国相连差不多），而天主教又是首先被传播开的，因此，后来一切从天主教信仰的怀抱中脱离出去的行动都必然导致一场反叛或者革命。

但是，在一个地理位置与别国隔离的日本国中，中国的儒教要以一种未经改造的形式传播是不可能的。从一开始，日本国民就或多或少地以他们自己的方式来接受儒教准则，并且对这些准则做出不同的解释，这是必然的。宗教革命很快（也许是不自觉地）就在来自中国和朝鲜的船上或是日本的海岸上开展起来。如果人们承认对同一个《圣经》的不同解释，能够在不同的民族中培育出相异的民族精神，并有助于创造出一种完全不同的经济环境，那么，应该说这种理论不仅应用于西方时肯定正

确，在应用于东方时也肯定正确。

儒教把仁慈（仁）、正义（义）、礼仪（礼）、学识（智）、信义（信）作为最重要的美德，并且相信仁是人类本质的美德。儒教相信人性从根本上来讲是善良的，特别是认为家族内部亲戚之间的自然影响是社会道德的基础。根据孔子的说法，道德的实践既不在于人们履行天命，也不受任何出类拔萃之辈的控制。当家庭内部成员间的慈爱被毫无敌意地扩展到家庭之外，如扩展到非家庭成员和完全陌生的人的身上的时候，人性便达到了完美的地步，社会秩序也就被恰如其分地保持住了，那些具有这种完美的人类之爱的人被称作仁慈的人，或有道德的人（仁者）。

孔子认为，成为这样一种人应该是一切道德修养的最终目标。可以认为，孝顺（孝）和履行作为弟弟的责任（悌）成了儒教最重要的美德。孝顺的内容包括尊敬父母，好好地照顾他们并按照他们的愿望行事；作为弟弟的顺从意味着要追随兄长的愿望。此外，和谐（和）是达到仁慈所必不可少的。和谐意味着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一致并在社会内部保持一致；不过，“和”这个概念也包括这样一种和谐：提倡一个人盲目地追随他人，这基本上是有害

的。同样，勇敢（勇）也被经常认为是达到仁慈的一个先决条件，不过，一个勇敢的人倒不必一定是个仁慈的人；勇敢必须是为了正确的目的。孔子憎恶那些没有礼貌的人，即使他是一个勇敢的人。

忠诚（忠）和信义（信）是两个真诚方面的美德。忠诚指的是一种自我意识上的真诚，即一个人没有虚伪和私心；信义则意味着总是讲真话。因此，信义是忠诚的外在表现。忠诚是存在于自我关系中的一种美德，而信义则是存在于与他人之间关系中的一种美德。但是，遵守一种从事非正义事情的诺言却是一个错误的行动，因此，忠诚本身并不能被认为是完美的道德。忠诚只能够和正义，或正当（义）连在一起来履行。同样，仁慈（仁）这个最重要的美德也必须与正义揉和在一起，并由学识（智）来增强；一种简单的、自发的仁慈是不够的。孔子是这样来描述一个真正的君子（或具有完美的德行的人）的：

“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

（《论语》第十六篇）

孔子提倡他所谓的道德治理的原则，这意味着一种通过道德方式来提高人民的素质的治理方法，这种治理方法自然是有助于通过提高人民的道德水准而带来社会的秩序。他强烈地反对任何法治的观念，他的理由是：在立宪政体的原则下，秩序是由法律强加给社会的，那些破坏法律的人受到处罚，这就使得人们去考虑如何能够最有效地逃避处罚。结果，社会就丧失了羞耻心。不过，即使是在一个德治原则统治下的社会里，某些与在法治社会中见到的法律相类似的东西也是必不可少的。这就是孔子所谓的礼，或叫礼仪。他所说的礼指的是由习惯所建立起来的准则，而习惯显然不如法律那样具有强制性。孔子的格言是“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如能这样，孔子认为，国民将“有耻且格”。孔子的信念是：社会地位高的人们的义不容辞的责任是依据“礼”的准则来行事。统治者与他的臣民打交道必须合乎习惯所规定的风尚；富人也必须用礼仪并根据礼仪来指导自己的行动和言论。

然而，日本所理解和传播的儒教却不是这个样子。这一点，从1882年天皇给日本军人所下的命令就可以看出来。这个命令是按照儒教的观点写成的，但决不是一个给有限的社会集团，即军人规定